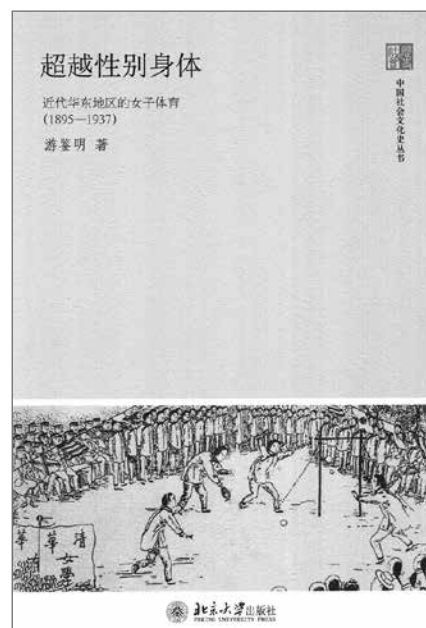


聚焦近代女子體育，深化性別身體研究

——評游鑒明《超越性別身體：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

● 侯杰、王小蕾



近代中國女子體育逐漸成為海內外從事中國婦女與社會性別史研究的學者愈來愈關注的議題。因為在這一時期，中國人參與體育運動的方式與看待體育運動的心態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女子體育的發展與女子體育觀的變動尤為明顯。

游鑒明：《超越性別身體：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近代中國以「應變」、「求變」著稱，不論是從政治到經濟、社會，還是從思想到行為、實踐，抑

或是從身體改造到體育運動，莫不如此。近年來，近代中國女子體育逐漸成為海內外從事中國婦女與社會性別史研究的學者愈來愈關注的議題。因為在這一時期，中國人參與體育運動的方式與看待體育運動的心態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其中又以女子體育的發展與女子體育觀的變動尤為明顯。對女子體育的提倡，既是近代男性知識精英向民眾進行社會啟蒙、提升民族競爭力的重要手段，更是女性身體解放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正因為如此，有不少學者聚焦近代中國女子體育，開展有關研究，並在一些重要領域取得成果。

海內外學者對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的研究幾乎同時起步。西澳大學學者樊紅討論了從1840到1949年中國女子體育的發展進程。她特別指出，西方傳教士和中國共產黨的體育政策使女性在運動中得到自由和解放^①。哥本哈根大學學者吉姆

佩爾 (Denise Gimpel) 則根據清末民初的報刊媒體，考察女子體育觀在近代中國社會的流變^②。台灣亞洲大學學者王惠姬揭示了1900至1937年女留學生推動中國體育發展的諸多貢獻^③。

其中，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游鑾明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為人所稱道。自1996年發表〈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初探〉^④一文起，她陸續發表了多篇有關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的學術論文，例如〈近代華東地區的女球員(1927-1937)：以報刊雜誌為主的討論〉^⑤、〈近代中國女子健美的論述(1920-1940年代)〉^⑥、〈媒體與近代中國的女子體育〉^⑦等。2009年，她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在台灣出版了《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一書^⑧，立即受到學術界的讚譽。正如美國加州大學教授莫里斯(Andrew Morris)所言，這部著作不僅提升了近代女子體育研究的重要性，還奠定了作者在學界的地位^⑨。2012年，該書在中國大陸出版，並更名為《超越性別身體：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以下簡稱《超越性別身體》，引用只註頁碼)。

這部聚焦清末直至民國時期華東地區女子體育的著作，兼採文字史料與圖像史料，再現了近代中國女子體育初創時期的歷史印迹，在「性別身體」的視域中提煉出女子體育運動背後的性別意涵。在書中，作者不僅呈現了現代體育傳入近代中國後女性所產生的新觀念和新行為，更反映出女子體育如何在公眾輿論、學校教育、學生生活、運動

競賽、觀眾反應乃至大眾傳媒以及視覺文化等方面產生的意義。這樣一來，作者不僅為近代中國體育史提供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性別詮釋，豐富和補充了學者對近代中國婦女與社會性別史的認知，還令體育史、婦女與社會性別史以及近代中國史研究得到了互證和互補，進而催生出一些新的認知。讀罷該書，筆者也深受啟發，由此產生對近代女子體育及性別研究的一些思考。

一 解讀近代女子體育的史料基礎

在婦女與社會性別史的史料中，涉及近代女子體育的材料可謂浩如煙海，極為分散，缺乏系統整理，散見於檔案、報刊、傳記、自傳、日記、書信、口述史等史料之中。在當今社會，正在興起的視覺文化研究開闢了認識人類生存、發展的新樣態，挑戰了人們展示大千世界的固有模式，與近代女子體育發展相關的圖像史料譬如照片、圖畫、電影等也亟待發掘。《超越性別身體》一書在史料應用上給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提供了很好的範例。雖然該書使用的主體史料是報刊，但作者卻並未忽視檔案、自傳、書信、小說的價值，並將之與報刊資料比對，取得互為文本的效應。作者還將照片、漫畫、廣告、電影等視覺文化史料納入分析範疇中。透過這些豐富的史料，作者對近代中國學校、政府、媒體如何通過提倡女子體育，從而聯手改造中國女性

《超越性別身體》這部聚焦清末直至民國時期華東地區女子體育的著作，兼採文字史料與圖像史料，再現了近代中國女子體育初創時期的歷史印迹，在「性別身體」的視域中提煉出女子體育運動背後的性別意涵。

該書使用的主體史料是報刊，但作者並未忽視檔案、自傳、書信、小說的價值，還將照片、漫畫、廣告、電影等視覺文化史料納入分析範疇中，這為近代中國學校、政府、媒體如何通過提倡女子體育，從而聯手改造中國女性的身體做了極好的詮釋。

的身體做了極好的詮釋。這既體現了她寬闊的學術視野，又為近代中國婦女與社會性別史研究開闢出新的路徑。

掌握豐富的史料僅僅是從事近代女子體育研究的開始，為了得出嚴謹、縝密的結論，研究者還要洞悉不同史料的性質和特色，以批判的態度解讀出史料所蘊含的價值、意義。這樣才有助於理清近代中國女子體育史研究中所蘊含的諸多議題，如身體觀、教育制度、國族主義以及兩性關係等等。比如有關近代女子體育的檔案史料記錄了政府、社會團體和學校對於發展女子體育的規劃，為研究者考察近代女子體育的相關政策提供了支持。而作為隨着中國近代社會產生和發展而出現的史料，報刊則是特定時代對社會的公開記錄^⑩。它不僅保存了與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發展和變遷相關的大量歷史信息，還成為研究者論證相關議題的切入點和論述場域。此外，與讀者的緊密互動也是報刊媒體的一大特點。因為「報紙是一種群體的自白形式，它給群眾提供一種參與的機會……正是由於許多新聞和事件並列於報端使公眾每天耳濡目染，才使報紙具有令人感興趣的多重性的廣闊範圍」^⑪。

在第一章「眾聲喧嘩的女子體育觀」中，作者就抓住了這個特徵，透過報刊、報人、讀者之間的三方互動，對下列涉及女子體育觀在近代中國之發展演變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首先是社會各界人士對開展女子體育的目的以及運動方式的看法；其次是國家民族女子體育觀與稍晚產生的健康美的女子

體育觀的碰撞與承接；最後是關於女性應當如何從事體育運動的論辯以及不同時代的嬗變附加在女性身體及其行為背後的道德與意識形態內涵。這既可以探究女子體育觀在近代中國社會傳播的基本路徑，也可以使研究者有效結合相關歷史語境，把握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發展的時代意義。

儘管檔案與報刊在近代女子體育研究中十分重要，但研究者也應重視日記、書信、自傳、口述史等史料的價值。因為它們不但展現了客觀的歷史事實，還反映了廣大女性在從事體育運動中的主體經驗和主觀意識，字裏行間流露出作者的某些真情實感。《超越性別身體》一書即大量採用了上述史料，而對口述史的成功應用，更使該書的研究層次和學術品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口述史既是一種史料，更是研究近現代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方法。口述史對近代中國婦女與社會性別史研究到底有何作用？張玉法曾有着精闢的論述。在他看來，在芸芸眾生的歷史中，有形的史料最缺乏家庭生活史、社會生活史以及婦女與社會性別史，需要借助口述史的方法來研究^⑫。的確，從研究者的角度來看，面對近代中國婦女與社會性別史研究資料的不足，口述史的價值不容小覷。因為女性受訪人的講述，有助這群「失語者」重新找尋歷史定位，減少受到男性的操弄和代言。其價值不僅在於彌補女性的歷史，也對以男性為中心的歷史提供了新的觀察角度。更何況當男女兩性講述各自的個人生命

歷史時，不僅能夠呈現出自身的主體性，也可以帶給史家一些意外，甚至驚嘆，從而有重新詮釋或重構歷史的必要。

在進入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研究之前，游鑒明也曾有着長期從事女性口述史研究的豐富經驗。在她看來，通過口述史料分析近代社會變遷中的性別建構，不僅能呈現不同性別的多元形象和交錯關係，口述史料還可以與其他文獻資料相互檢證，提示我們新的研究方向^⑬。在第三章「女學生的體育生活」中，作者便借鑒了以往從事口述史研究的豐富經驗，對民國時期曾經在華東地區就學的女性進行訪談，搜集整理出彌為珍貴的大量史料。在訪談過程中，作者不僅看到了體育如何融入女學生的生活，還借助體育運動的視角探究了女學生群體內部的差異性和共同性，從女性獨有的性別經驗出發，公允地評價她們在歷史變遷中的作用，認識其發掘主體性與完成自我賦權的歷程。

書中雖然將女性的口述作為直接引用的資料，但作者在其中對史料卻少有批判，例如：「金陵女大體育系的王明霞回憶，騎自行車是金陵女大的必修課，不會騎自行車，就不能畢業。當時她們騎車上街，很引人注目，有些好事的男生常常有意的撞上來，但王明霞並不怕，她說：『你撞我，我也撞你，金女大的學生可不是好惹的。』」（頁112）此外，被訪者的敘述受哪些因素影響、訪談者和被訪者之間有着怎樣的權力關係、二者的主體性如何相互發生作用等，作者可以有更深入的探討。這在某種

程度上使該書不能超越表面的立場，突出主體與世界、歷史過去和婦女地位間的複雜、曖昧甚至矛盾的關係。

除了文字史料外，以照片、廣告、漫畫、電影為代表的視覺史料也循着各自的傳播邏輯，將女子體育運動的大量信息呈現到近代中國人的面前，與文字史料形成了互補和對應的關係（頁188）。中國史學素有「左圖右史」的傳統。視覺史料與文字史料有着顯著的差異，不僅有不同的創造者、傳播媒介，也有着不同的接受者和議題，因而能給予讀者更強烈的感受，從而顯示出文字史料不易展現的歷史面向^⑭。長期以來，文字史料在歷史學家眼裏似乎是意蘊深邃，而視覺史料只是一種光鮮亮麗的載體，至多起到輔助和點綴的作用。然而，1980年代以來，視覺文化的研究熱流正在顛覆歷史學界對圖像史料的固有認知。對圖像史料的解讀也成為學者在開展各項研究時所必不可少的工作，一系列創見相繼提出。黃克武曾指出，視覺史料的價值不只是作為文字史料的附屬品（如插圖），它更能觸及宗教、族群、性別、階級等的界域劃分以及不同界域之間的相互關係，其內涵不僅包括理性思維、理念傳遞，亦包括情感表達、群體的記憶和認同，因而具有主體性的地位^⑮。

因此，研究視覺史料應尊重其中所蘊含的群體或社會共享的價值，研究圖像對歷史的再現是如何生產和流布的，這樣方能凸顯圖像史料在歷史研究中的主體性。另外，解析視覺史料時還應注意它所

書中雖然將女性的口述作為直接引用的資料，但作者在其中對史料卻少有批判。此外，被訪者的敘述受哪些因素影響、訪談者和被訪者之間有着怎樣的權力關係、二者的主體性如何相互發生作用等，作者可以有更深入的探討。

《超越性別身體》一書將有關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的重要議題置於「性別身體」這一概念之下。一方面，「性別身體」是指不同歷史時期，社會對男女兩性身體活動空間的安排；另一方面，「性別身體」是指社會對兩性身體的塑造。

表現出來的文字史料所沒有的意涵。筆者與研究團隊曾提出在解讀畫報等視覺史料時要注重圖文互證、圖文互補、圖文互觀等方式的採用，以準確解讀出其中的豐富涵義^⑩。海內外學者關於視覺文化研究的相關成果是值得借鑒的。例如豪厄爾斯 (Richard Howells) 的《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 就從圖像的外觀、形式、意識形態等角度詮釋圖像的意義^⑪，啟發研究者以新的視角、方法領略圖像史料的奧妙，將圖像史料的內容和主題高度結合，這也為近代中國女子體育乃至婦女與社會性別史研究開闢新的視野。

作者在第五章「廣告與藝術文化中的女子運動」中，便將視覺史料作為分析的對象。書中主要援引的視覺史料有以女運動員為肖像的廣告、展現女子體育發展及運動場內外性別關係的漫畫作品、鼓勵女子從事體育運動的影視作品等 (頁 187-229)。這些視覺史料展現出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的發展演變以及其中所承載的國族命運與社會文化意涵，其所呈現的並非單一的女子體育史，而是多層次、多姿多采的女子「運動」圖像。

二 「性別身體」與「社會性別」

《超越性別身體》一書的作者，在通讀史料的基礎上，將有關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的重要議題如女子體育觀、女子體育政策、女性對體育運動的參與、媒體中的女子體育進

行了有效的勾連。同時，作者還對下列問題進行了多維的審視：近代中國女子體育在怎樣的社會環境下艱難起步？女子體育在國族命運、兩性關係和公共輿論中所產生的社會文化意涵是甚麼？體育運動如何建構性別文化？女性的體育運動生活之日常模式究竟為何？女子體育在近代華東地區的開展是否符合宣導的初衷？凡此種種，不但能擴大對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的發展演變、表現形式、影響地位等方面的研究，也可以豐富近代中國婦女與社會性別史的研究內容。

另外，為了在研究中突顯新的學術內涵，《超越性別身體》一書還將上述問題置於「性別身體」(Gender Body) 這一概念之下^⑫。所謂「性別身體」有兩層含義，一方面，「性別身體」是指不同歷史時期，社會對男女兩性身體活動空間的安排。在中國歷史上，男女兩性的身體活動空間從來就是隔離的或不平等的^⑬。女性身體的活動向來被排斥於一定空間之外，或局限於一定空間。正如陳東原在《中國婦女生活史》中所揭示的那樣：「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⑭在近代中國，女性對體育運動的參與，有助於突破以往社會對女性活動空間的限制。這不僅能夠幫助她們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主體身份，也能夠令她們在面對男性的挑戰、與男性的切磋中確立新的兩性關係模式，最終調整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價值。

另一方面，「性別身體」是指社會對兩性身體的塑造。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oir) 就曾關注到其中所蘊含的性別差異：在主體與身體的關係中，兩性是有差異的，在父權制社會裏，女性的價值與她們的身體息息相關，男性的價值不是與身體密切相關。由此，她也提出了這樣的著名論斷：「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變成的。」^②繼波伏娃之後，巴特勒 (Judith Butler) 也強調「性別身體」實際上具有可變性，恰恰是身體的持續行動與變化形成了社會性別。「當生理性別從其自然化的內在和表面解放後，它可以成為展現性別化的意義，進行戲擬增衍以及顛覆遊戲的一個場域」^②，這一點在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發展演變的歷史中也不斷得到印證。晚清時期，在救國保種的呼聲中，提倡體育運動，打造尚武的女性身體的言論和行動蔚然成風，成為塑造國民之母和女國民的重要手段。五四新文化運動後，隨着社會對女性身體解放的認識趨於多元，加之西方健美觀的傳入，健美的女性備受歡迎，並被當作「摩登女性」的代名詞。可見，身體在一定程度上充當着定義性別身份的依據。

《超越性別身體》一書對「性別身體」的討論，不僅是從權力話語的內部探究性別分工的規律，更是為了展現女性超越身體局限，獲得發展潛能的歷史進程。通過它，研究者能夠依循女性身體的重塑、女性活動空間的擴展兩條線索，釐清近代華東地區乃至中國女子體育發展的歷史脈絡，並使研究與相關的理論方法相結合。

此外，本書透過「社會性別」(Social Gender) 視角，也有助於剖析相關問題，如女子體育觀的形成演變，國家、學校以及社會機構關於發展女子體育的政策，報刊媒介對女子體育的宣傳，以及女性的體育運動實踐等。「社會性別」是在西方第二次女權運動浪潮中出現的一個分析範疇^③。它是人類社會組織性活動的一種制度，同任何文化中都有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一樣，任何文化中都有自己的社會性別制度。它除了通過家庭、勞動分工、教育、政治體制等多方面發生作用外，還與文化象徵性符號、規範性概念，以及人的主體性身份形成密切相關。人的社會化過程就是一個社會性別化的過程。社會性別的規範無處不在，其權力關係也一直處於動態的演變當中。差異在社會性別權力關係的建構中十分重要。其中，對差異的描述把社會區別於社會現實，而分析這些差別所形成的

《超越性別身體》一書對「性別身體」的討論，使研究者能夠依循女性身體的重塑、女性活動空間的擴展兩條線索，釐清近代華東地區乃至中國女子體育發展的歷史脈絡。



晚清時期，打造尚武的女性身體的言論蔚然成風。

近代中國女子體育史畢竟是一個圍繞身體而展開研究的領域，需要引入身體研究及身體史理論。兩性之間的互動、性別之間的權力糾葛需要透過身體的規訓來彰顯。

歷史，則瓦解了差別作為現實而存在的固定性，從而把差別以及由差別構成的種種社會等級再塑為受一定條件限制的、有鬥爭的變化過程的產物。由此，人們認識到差別和由差別構成的（如婦女和婦女之間的）不同身份和具體背景——歷史的關聯²⁹。

那麼，作為一種學術實踐的社會性別視角對從事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研究的學者又有哪些具體的啟示呢？眾所周知，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發展的歷史始終是跟國家民族主義的話語糾纏在一起的，而在這一話語中，女性身體解放作為現代化的標誌又被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所以在研究的過程中，既要對國家民族主義進行剖析而又不損害主流話語中婦女歷史和婦女解放的合理地位殊非易事。從這個角度看，社會性別視角之於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研究的確有着巨大的價值。正如《超越性別身體》一書的作者所言，社會性別視角可以幫助人們：

一方面跳脫過去國家觀的體育史的窠臼，重新審視國家與社會、文化的關係。同時，也試圖為近代中國史提出新的觀察……近代中國女性用運動的身體改寫女性歷史時，充滿着活力，而引來社會現象和各種議論，讓女子運動變得複雜與矛盾，其實這也是近代中國女性歷史的一小部分。（頁14）

為體現社會性別視角在研究中的價值，學者應注意以下兩點：首先，要充分重視婦女所撰寫的歷史、關於婦女的歷史以及從女性主

義觀點出發所撰寫的歷史。這樣才能在近代中國女子體育史的書寫中體現女性的主體性，挖掘女性不同於男性的歷史和經歷；其次，不能忽視性別之間的互動在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研究中的意義。雖然一些學者擔憂這會把時間、精力、資源消耗在不是女性主要關注的問題上，從而進一步削弱女性的重要性；甚至有人還擔心將男性納入到近代中國女子體育歷史的書寫中會削弱該議題的研究價值，但是，社會性別作為社會的構成，本身就包含男女兩性通過社會學習到的與性別相關的一套規範的期望和行為。兩性之間的互動在研究中的意義不言自明。近年來，相關研究也多將男女兩性視為共存的整體，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對立面。這不僅能突出男女兩性對自我身份和角色的體認，更可凸顯二者在特定歷史語境下的權力關係。

三 理論提升與經驗推廣

近代中國女子體育史畢竟是一個圍繞身體而展開研究的領域，需要引入身體研究及身體史理論。兩性之間的互動、性別之間的權力糾葛需要透過身體的規訓來彰顯。自1970年代起，「身體」成為西方人文科學研究者關注的焦點。福柯（Michel Foucault）先後撰寫了《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等書，揭示了圍繞着身體與生命的

權力運作機制，奠定了身體研究的重要基礎²⁵。在此基礎上，英國社會史學家伯克 (Peter Burke) 更是提出了「身體史」(The History of the Body) 的概念，並將其歸入新文化史的範疇之內²⁶。此後，身體史的研究領域還在繼續擴充，並將姿態史、性史、情感史、恐懼史和幽默史納入其中。

實際上，身體史與社會性別史研究淵源頗深。一方面，身體研究的興起，很大程度上也是得力於女權主義者的推動；另一方面，身體史的研究領域與社會性別史的研究領域存在着相當多的交叉重疊，諸如生育史、性史等等。在實現身體史與社會性別史交叉研究的過程中，不少海內外知名學者，如高彥頤、費俠莉 (Charlotte Furth)、李貞德等人就做出了傑出的貢獻²⁷。她們無不透過鮮明的問題意識、靈活的敘述策略，展現了身體與性別之間錯綜複雜的聯繫。

同樣，身體研究的重要理論也有助於分析圍繞女性身體而形成的權力關係。在《超越性別身體》一書中，作者便試圖用福柯的「規訓」(Discipline) 理論闡釋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的發展與國家、政府政策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她指出：「擁有規訓權力的並不完全是父權或男權，女性潛在的權力同樣不可小覷……她們不只透過書寫，還包括組織、行動，並利用團體的力量更為徹底地規訓同性的身體。」(頁 275)

不僅如此，作者還意識到「觀看」同樣是圍繞身體所產生的權力關係。從清末到 1930 年代，近代中國女子體育所衍生的觀看行為，

在不同人的筆下，充滿着各種複雜的糾葛。正如作者所言，「看與被看的權力不僅是男性所獨有」(頁 278)，而是被男女兩性所分享。誠然，在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發展的初期，某些女性的確不敢在男性的凝視下參與運動。但當體育成為熱門活動後，參與運動的女性逐漸能接受凝視，甚至主動引起注意。她們不僅身體力行挑戰極限，不斷打破運動紀錄，也用身體引領風騷，形塑都市的時尚文化(頁 278-79)。可見，在近代中國女子體育史上，看與被看之間不僅瀰漫着身體權力的話語，還形塑着社會性別權力關係。而這種從身體史的角度介入到近代中國女子體育乃至近代中國婦女與社會性別史的研究路徑，也足以向讀者展示建立在豐富史料基礎上、基於不同閱讀立場所獲得的別樣意義，在近代中國女子體育史研究的方法論方面，是一個頗具新意的嘗試。

需要指出的是，若要在「性別」和「身體」的視域下審視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的發展，恐怕還應將視野擴大至整個中國，只依靠華東地區的經驗所得到的結論是不完整的，因為中國地域遼闊，各地文化千差萬別，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身體、性別觀念以及超越性別身體的實踐迥異。筆者與研究團隊在致力於華北地區社會性別議題探討的同時，也整理了大量關於該地女子體育發展的史料，包括檔案、官方文書、報刊、日記、圖像等，以便在日後與華東等地區進行比較與分析。

為深入理解這段旨在超越性別身體的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發展史，學者還應採用跨文化的視角，關注

若要在「性別」和「身體」的視域下審視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的發展，還應將視野擴大至整個中國，只依靠華東地區的經驗所得到的結論是不完整的。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身體、性別觀念以及超越性別身體的實踐迥異。

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互動，並回答以下兩個問題：一、中國女子體育的源頭——西方女子體育對改寫西方女性身體歷史，挑戰社會性別權力分工的意義何在？二、西方世界出現的既贊成女性鍛煉身體又害怕運動會傷害女性特質的矛盾觀點，是否也在近代中國產生影響？對於上述問題的解答，有助於研究者探尋東西方女性通過解放身體完成自我價值提升的共同經驗，從中找到複雜的差異現象，為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研究打開新思路。

四 小結

總而言之，近代以來，女性對體育運動的參與之於女性身體的解放和性別權力關係的重構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參與體育運動不僅是女性超越自我、解放身體的手段，更在一定程度上撼動着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價值。女性在參與體育運動時所帶來的兩性問題和新的社會觀也成為了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凡此種種，不僅讓這一研究領域擁有了更大的討論價值，還吸引愈來愈多的研究者參與其中。

游鑒明的《超越性別身體》一書，從「性別身體」的視域出發，在廣泛搜集文字史料與圖像史料的基礎上，針對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發展的若干問題提出了頗多創見，對從事相關領域的學者啟發頗深。這部有關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研究的佳作在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出版，有助於兩岸學術交流，擴大作者在中國大陸的學術影響，推動近代中國女

子體育研究、婦女與社會性別史研究。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有關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研究的佳作將不斷湧現，學者對女性身體解放運動的認識也會繼續深入。

註釋

① Fan Hong, *Footbinding, Feminism, and Freedom: The Liberation of Women's Bodies in Modern China* (London; Portland: Frank Cass, 1997).

② Denise Gimpel, "Freeing the Mind through the Body: Women's Thought on Physical Education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8, no. 2 (2006): 316-58.

③ 王惠姬：〈二十世紀前期女子留學生與中國體育的拓展〉，載《走向近代》編輯小組編：《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台北：東華書局，2004），頁253-304。

④ 游鑒明：〈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初探〉，《新史學》，第7卷第4期，1996年12月，頁119-56。

⑤ 游鑒明：〈近代華東地區的女球員（1927-1937）：以報刊雜誌為主的討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9年第32期，頁57-122。

⑥ 游鑒明：〈近代中國女子健美的論述（1920-1940年代）〉，載游鑒明主編：《無聲之聲（I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社會（1600-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頁119-58。

⑦ 游鑒明：〈媒體與近代中國的女子體育〉，載游鑒明、羅梅君（Mechthild Leutner）、史明（Nicola Spakowski）主編，洪靜宜等譯：《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頁107-26。

⑧ 游鑒明：《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⑨ 莫里斯(Andrew Morris)對游鑒明《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一書的評論，參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年第69期，頁171-75。

⑩ 參見張革非、楊益茂、黃名長編著：《中國近代史料學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頁182。

⑪ 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著，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256。

⑫ 張玉法：〈張序〉，載游鑒明：《傾聽她們的聲音：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口述史料的運用》(台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頁5-6。

⑬ 游鑒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口述史料中的性別形象〉，載《她們的聲音：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155-217。

⑭⑮ 黃克武：〈導論：映現抑或再現？——視覺史料與歷史書寫〉，載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達與文化構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i。

⑯ 侯杰、李釗：〈媒體、視覺、性別——以清末民初天津畫報女性生活為中心的考察〉，《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頁134-40。

⑰ 參見豪厄爾斯(Richard Howells)著，葛紅兵等譯：《視覺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⑱ 參見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著，陶鐵柱譯：《第二性》(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巴特勒(Judith Butler)著，宋素鳳譯：《性別麻煩：女性主

義與身份的顛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⑲ 參見蘇紅軍：〈時空觀：西方女權主義的一個新領域〉，載蘇紅軍、柏棣主編：《西方後學語境下的女權主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48。

⑳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221。

㉑ 波伏娃：《第二性》，上冊，頁10-11。

㉒ 巴特勒：《性別麻煩》，頁42。

㉓ 斯科特(Joan W. Scott)著，劉夢譯：〈性別：歷史分析中一個有效範疇〉，載李銀河主編：《婦女：最漫長的革命：當代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精選》(北京：三聯書店，1997)，頁151-75。

㉔ 斯科特(Joan W. Scott)著，鮑曉蘭譯：〈女性主義與歷史〉，載王政、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370。

㉕ 福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楊遠嬰譯：《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北京：三聯書店，2003)；福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北京：三聯書店，2007)。

㉖ 楊豫、李霞、舒小昀：〈新文化史學的興起——與劍橋大學彼得伯克教授座談側記〉，《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1期，頁143-50。

㉗ 高彥頤著，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費俠莉(Charlotte Furth)著，甄橙譯：《繁盛之陰：中國醫學史中的性》(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李貞德：《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台北：三民書局，2008)。

侯杰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王小蕾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